

遼寧文史資料



K250.6
38
2:10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B138281

辽宁文史资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第十辑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大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6%

印数: 1—4,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鸿宾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47

定价: 0.84元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核正所征集到的史料，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并用以推动史料的征集工作。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本选辑所刊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

三、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作文字修改。

目 录

回忆高崇民同志·····	聂长林 (1)
回忆阎宝航同志·····	卢广绩 (27)
光复后张学思同志在东北·····汪文江口述 朱焕阶整理	(45)
国民党时期我任沈阳市教育局长的回忆·····	陈彦之 (52)
关于黄慕与东北模范学生队·····	赵龙韬 (76)
安东缫丝工人同盟大罢工·····	丹东市政协文史办整理 (81)
奉天省城大中学校学生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经过 ·····	郑殿起 (89)
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前前后后·····	郭民任 (93)
“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大学·····	姜作栋 (114)
记东北大学进步学生抵制国民党接管的斗争·····	陈彦之 (118)
奉天贫儿学校简记·····	张璞山 (124)
私立海城同泽中学简史·····	孙恩元 (134)
海城同泽中学始末·····	高 嵩 (142)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究竟控制在谁的手中? ·····	曹延亭 (152)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纪要·····	罗巨峰 (156)
奉天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吴建白 (168)
忆东北中学·····	李江春 (175)
奉天维城学校·····	荣恒山 (185)
在沈阳第一次解放和四保临江中的回忆·····	郑 文 (193)

回忆高崇民同志

聂 长 林

崇老，是从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认识高崇民同志之后，一直沿用的对他的习惯称呼。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在三台东北大学就读，接到白皓同志的信，告诉我他“已经找到门路”，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用的隐语，即找到了共产党。我和白皓等几个同学，于一九四三年寒假从伪满逃出后，曾在冀东、北平和豫北几次踏上去解放区的路，因种种原因，均未能如愿。不得已辗转到了重庆，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大家深有“悔不该来”之感。也曾试图从《新华日报》门市部找出路，因引起特务盯梢而终止。听说在东北大学有希望找到党的组织，我便进了东北大学。大家相约找到党之后互通消息，以实现去解放区的夙愿。白皓的信，真是阴霾漫漫中透出了蓝天，我胸中立即燃烧起希望之火。年末，白又来信要我和孙汉超同志即去重庆。我们遂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起程，绕道成都到重庆。从此，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末我离开重庆，与崇老共同工作和生活了八个月。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崇老兼任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我在崇老直接领导下工作近四年。崇老调京后，常来东北视察工作，我也每年都要去京开会，因此，每年都可见面。一九六四年我调京工作后，逢年过节也总去看望。

这篇回忆，是与崇老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仅就记忆所及整理出来，以资追念。

一、艰苦而乐观的重庆战斗生活

《反攻》杂志社的地址，濒临嘉陵江，在化龙桥对岸猫儿石李家坪三十七号，崇老就以社为家住在该处。这是一幢孤立于李家坪之东的旧式二层楼，上下共六间，除楼下西面的一间住着张申府、刘清杨夫妇，楼上东面一间为王卓然占用外，其余四间都为我们租用。崇老和王桂珊带着三个孩子住一间，刘砥方、绿川英子夫妇带孩子住一间，我们三个年轻人住的一间兼作饭厅，最后一间是《反攻》编辑部。楼东头有一跨间，是厨房和炊事员宿舍。

砥方、绿川夫妇原在郭老（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崇老为加强《反攻》杂志，商得郭老同意，借调到《反攻》。他们和我们的先后到来，崇老为《反攻》能够重振旗鼓而高兴。他说：“德不孤，要有邻”，从一九四二年“东北救亡总会”被国民党解散后，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坚持《反攻》编辑工作时起，他就相信《反攻》和它所代表的抗日救亡事业会重新兴旺起来的。旧年除夕晚上，崇老积极主张过个“家乡年”，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时，他感慨地说，从“九·一八”之后，他就没有正经八百地过一次年。

在我们到后几天的一次会上，崇老宣布：我们的经费主要靠从各方面募集，勉强维持《反攻》出刊。我们既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团体，就学习延安的办法，叫“军事共产主义”，没有工资，写文章也不拿稿费，大家一锅吃饭，同甘共苦。接着，他介绍了一九三八年他去延安的见闻：包括毛主席在内，大家都穿土布灰军装，不经介绍，你就分不出首长和士兵。尤其是朱总司令，无论从朴素的穿着或平易近人的作风，你都无法看出他就是名震中外的红军统帅。上下团结友爱，军民亲如一

家，风气迥然不同。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一番话，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我们刚到《反攻》编辑部时，按世俗彼此互称“先生”。也是在那次会上，砥方同志提议：互称先生，不符合我们间的关系，也应该学习延安敬老的精神，高先生年最长，是我们的前辈，政治上组织上是我们的领导，是否以后就称为“崇老”，我们彼此之间就直呼名字，这样才亲切。崇老这个称呼，就是从此一直延续下来的。以后援此例，称阎宝航同志为“阎老”，称陈先舟同志为“先老”。

我们的生活，确实很苦，几乎天天顿顿都是“平价米”（一种按官价出售的糙米），和四川常年盛产的紫苋菜和无心菜。崇老也和大家围坐在一桌共餐。一次，阎老到我们那里开会，知道我们生活困难，出钱给我们“打牙祭”，我那顿竟吃了七碗饭。阎老惊讶地说：“这可以看出你们平时是怎样生活的。”阎老当时在肖振瀛经营的“大明公司”任经理，是《反攻》经费的主要供给者之一，我们没钱买纸或《反攻》揭不开锅盖时，就临时找他应急。接着，阎老谈了这样一件事：他因接济《反攻》之急，从公司借支过多，公司总会计拿着借条找肖振瀛批销，肖却批了“欠债还钱”四字。总会计以批示给阎老看，阎老把借条撕碎丢进纸篓，说：“你告诉肖董事长，我还他妈个蛋！”崇老说：“肖振瀛因《何梅协定》时牵线‘有功’，何应钦批准他成立‘大明公司’，打捞长江沉船发了财，我们用点搞抗日救亡还不是正用！”阎老激励我们说：

“现在虽然经费有困难，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坚持《反攻》出刊，保证大家的最低生活。”

一九四五年初，林伯渠同志到重庆时，送给崇老一些小米。崇老对我们说：“这是延安最好的粮食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的日常主食就是小米。”流浪生活已使我们对粗茶淡饭习以为常，并未感到《反攻》社的生活苦。我们吃了那顿延安小米饭之后，总感到自己和延安产生了某种联系，心里甜丝丝的。

一次，崇老看到我的裤子已经补得不能再穿，就要桂珊同志拿来他的一条送我。我身量比崇老高约二十公分。我比了比说：“这怎么能穿呢？”崇老笑着说：“把裤子脚放开就够你穿的！”原来裤脚是叠了几层缝在一起的。我问崇老为什么把裤子作得那么长？崇老说：“那是以前同志们离开重庆时留作不时之需的，我未舍得剪掉。”几年来，崇老就是这么凑合过来的。我在重庆期间，从来未见他购制一件新衣服。日寇投降后，我和孙汉超等离开重庆时，崇老拿出一些高级西装要我们到寄卖行去卖，作为我们的费用。并告诉我们：这些西装是宁匡烈等同志去苏联时留下的，他连一件也未动过。

我们到市内办事，须乘轮渡过江，只好向桂珊同志拿往返的船钱；必须在市内吃中饭时，就到阎老、先老或杜弘如同志家去打扰一顿，往往给我们打一次“牙祭”。

物质生活虽如此艰苦，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极为充实的。除日常工作之外，每周一次时事座谈会，轮流担任主要发言，综述一周的国际、国内局势，大家讨论。这是学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我们当时称“办事处”）的作法。党的“七大”之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我们的学习内容就更丰富了。

崇老除全面领导我们这个团体的工作外，经常去办事处请示汇报工作，参加民主同盟、“小民革”（即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等的活动，找“南山五老”（即住在长江南岸的莫德惠、万福麟、汤玉麟、刘海泉、邹作华）做工作，接触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很少有空闲时间。他跋山涉水，爬上

爬下，尤其是盛夏，顶着烈日在素有“火盆”之称的重庆的坡路上奔波，即使是我们当时二十几岁的青年，也是“几步一身汗，爬坡张嘴喘”。崇老当时已经五十四岁，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崇老每次从市内回来，都不顾疲劳，把孩子抱在膝上，向我们传达党的指示和参加各种活动的情况。砥方同志曾套用当时茶馆流行的一副对联讽誉崇老：“为国忙，为家忙，忙里偷闲谈谈政治；开会苦，跑路苦，苦中作乐抱抱孩子。”

崇老也确实是以这些“苦”为乐的。他很鄙视那些在国难时期自命清高的人。我们的房东李觉先生曾与崇老同时留学日本，在重庆挂“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牌子，但从来不去市内从事业务，经常住在李家坪名为“穹庐”的别墅里，看些杂书，作些诗以自娱。因距我们很近，我们有时也在晚饭后到他别墅前的草坪上乘凉。一次，他以自己的新作七绝一首念给崇老邀和。其诗曰：“为避兵火寄穹庐，此身渐与朝市疏；若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崇老听后略思片刻，说：“意境不错，写出了你的境况，可谓‘诗言志’。我也不揣粗陋，奉和一首。”即念道：“羡君高卧有穹庐，我坐穹庐梦亦疏；国难当前无所事，小楼羞对古人书。”字里行间的寓意和彼此间人生态度的鲜明对比，使李虽甚尴尬，却不得不以称赞崇老成诗之快来自我解嘲。

二、“四十而不惑”

在重庆期间，崇老经常在晚上和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往往以亲身经历夹叙夹议地谈一些历史事件。砥方曾有过这样的赞语：崇老一谈两三个小时，涉及那么多事件，但始终不离一个主题，如果加以记录整理，就成为一篇层次清楚，史论兼备的

文章。

崇老总是以鼓励的语气，说他羡慕我们在二十几岁就走上党所引导的革命道路；他在我们这个年龄时，虽然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但回忆起来，却是在“瞎摸海”中度过的，直到四十几岁接触了党的组织，才应了孔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崇老的父亲是个塾师，深恶清末官场的腐败，鄙视钻营利禄之徒，立志于传播圣贤之道，以正人心。父亲对他，既是严父，又是严师，训诫也苛于其他同学。“甲午”、“庚子”和“甲辰”这些民族灾难都相继发生在他的幼年时期，尤其是光绪二十六年帝俄军队在东北的劫掠和法国传教士在家乡的肆虐，使他产生了怀疑，“堂堂大清国怎么总是受外人欺凌？”他不安心读书了。山村僻寨，外界的消息都是由赶集上店的人从山城镇传来，他就想去山城镇长长见识。就在九岁那年，他背着家人去山城镇。山城镇距家八、九十里。因他不识路程，逢人便问，被人察觉是私自离家的，就把他送了回来。他原准备接受父亲一次严厉的责罚。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一向严厉的父亲，听他说出要去山城镇的原因，不仅没有呵斥，反而流了泪，向他讲了一些中国人应该奋发图强的道理。崇老说：他父亲原是个“有泪不轻弹”的人，那次对他感动最深。他原来爱淘气的毛病也从此改掉了，锐意读书，“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等古典知识，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真正使他接触新知识开阔视野的，是从十八岁到“奉天农林学校”读书时开始的。那时，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三岁的宣统登基，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情况，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及其革命活动情况，都在当时的奉天（沈阳）暗中流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这些新思想，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认识上开

辟出一个新的境界，他毅然加入了同盟会，秘密地传播倒清的主张。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等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些原来残酷镇压革命的满清官员，也被拉入国民党，“平均地权”等也不再提了，从组织到纲领都失去了革命的味道，他“不愿与尔曹为伍”，没有加入国民党。他去日本留学，正是袁世凯窃国时期，一些流亡日本的原同盟会员，多灰心丧气，思想混乱达于极点。在一次留日学生的集会上，关于是否倒袁的事，有的怀疑倒不成，有的怕引起国际干涉，众说纷纭。崇老回忆说：“我实在气不忿生，就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痛斥那种既想吃又怕烫的态度，竟被推为回国宣传倒袁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同封建专制势力妥协的教训，重新提出革命的主张，他才加入了国民党。

他从日本留学归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当时国内的情况极为复杂：一方面是“五四”的影响在扩展；一方面是美、英、日帝国主义加紧培植各自的势力，封建割据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接连发生。他目睹这种情况，无心步入官场，先后在沈阳、哈尔滨参与组织“民治俱进会”、“启明学社”、“国民外交协会”，传播反帝和民治思想，从事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因此，先被奉天省长驱逐出省，后又被东省特区长官押解回籍。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因与杜重远组织罢市反对苛捐杂税，又被张学良免去农会总务长职务。崇老说：张学良知道他这个人一向“桀骜不驯”，安排个挂名的农会会长和保安司令部秘书，以示羁縻。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发一弹丢掉了东北。崇老说：他把满腔怨愤都倾泻在张学良身上。当他得知蒋介石不抵

抗命令束缚得张学良无所作为时，遂参与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宣传活动，鼓动群众起来要求蒋介石抗日。崇老向我们介绍了一九三一年冬到南京请愿的事。他当面质问蒋介石：“东北人民主动‘易帜’，促成祖国统一，何负于中央？中央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何以对东北人民？”蒋介石被问得连发几个他习惯的口头语“这个吱”之后，斥责说：“政府自有政府的考虑，你们这种举动是不信任政府的表现！”他针锋相对：“我们没去广东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还寄予希望。”蒋被驳得张口结舌，便迁怒于平津学生，说：“东北人因家乡沦陷来请愿，平津学生跟来胡闹什么？”一个平津的大学生立即站起来说：“因为东北是祖国的神圣领土，东北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难道对国土被侵占、同胞遭蹂躏而坐视不顾才是不胡闹吗？”蒋被顶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钻进后台。

崇老说，他从此对请愿活动也不抱希望了，转而支持“东北义勇军”，支持“长城抗战”和“抗日同盟军”，但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之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洋考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被国民党解散。他又积极倡导秘密组织“复东会”，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这虽然躲不过特务的耳目，但也使国民党害怕。翌年，张学良从意大利学一套法西斯的东西回来，高唱“拥护领袖”，颇为投合蒋介石独裁的需要，蒋任命张为武汉行营主任；张为了重掌军权以为打回老家之计，就接受了蒋的任命。蒋还借此机会向张提议，由黄埔系的“复兴社”和“复东会”合组“四维学会”。崇老说他曾坚决反对，认为蒋的目的是吃掉“复东会”。“复东会”志在光复东北，而“四维学会”是援用“四维张则国令行”，以拥护蒋介石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那一套，没有一

点抗战的味道。但终因扭不过张学良对蒋的幻想，成立了“四维学会”。果不出他所料，“四维学会”成立一年多没有任何作为。为了“四维学会”目的是“拥护领袖”还是抗日救亡的问题，他同贺衷寒大吵一通就拂袖而去，学会也从此散伙。

崇老回忆说：当时他思想已苦闷到极点。为了抗日，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但都失败了。日寇步步紧逼，国民党一味退让，签订《何梅协定》，发表“邦交敦睦令”，严禁组织任何抗日团体。出路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真是感到前途渺茫，“山穷水尽”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到了上海。当时，他的老友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判刑入狱。他去探监时谈了自己的心情。杜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宋同志”（宋介农，即孙达生同志）。崇老对我们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宋同志也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年龄，但知识比你们丰富得多，说话不紧不慢，很健谈，也很幽默。”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讲到中国革命必由之路，分析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必然性，讲到唯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给他一些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崇老说：“经过多次交谈，使我豁然开朗，找到了真正革命的道路，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宋同志可算是我认识革命的启蒙老师，我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定了，就毅然决然地撕毁了国民党党证。”

三、走上党指引的道路

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促成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是崇老第一次接受党交给他的任务。崇老说：他是信心十足地首途西安的。

所以有信心，首先是自己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同

时，行前同阎宝航、杜重远和邹韬奋等同志反复研究，对张学良将军也有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张青年时期虽然有些纨绔气，但张作霖的被害使他有了“誓报家仇”的猛醒，毅然实行了东北“易帜”，个人也戒除了邪癖；东北沦陷后，他深感亡国之痛，“不抵抗将军”这个为人背过的污名，他是不甘心承受的。因此，他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特别是“剿共”已使他一再损兵折将，如果长此以往，实力耗尽，就一切都成泡影了。蒋介石要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实际是“一石三鸟”，以异己制异党，这种倒行逆施，只能使中国内战不已，抗日无望。崇老相信他的这些认识和分析，足以打动张学良将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崇老到西安，适张学良去南京，于是就首先对东北军中相知较深的高级将领如王以哲等人，以自己的新认识进行工作，果然见效，这就更增强了说服张的信心。经杜斌丞先生的引见，同杨虎城将军晤谈一次，彼此在大局方面见解颇一致，只是从谈话的口气中，感到他们对东北军不无顾虑。这样，对西北军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崇老以前向张学良有所谏净，往往急不择言，张在背后流露“高崇民太盛气凌人”。而这次，由于有信心因而也就耐心多了，同张的几次谈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张一直不置可否地听，有一次还把他留下作深夜长谈。最后张表示与西北军之间的误会较深，几经派人疏通都未成功。崇老见此情景，便主动请命：“只要副司令以我所谈为是，我去见杨将军解释误会。”

崇老再见杨虎城，是以受张之托的身份去的，坦率地谈了张的处境和心情；并着重指出蒋介石“一石三鸟”的险恶用心，两军应该力避其间，捐弃前嫌，联共抗日。崇老说：杨虎城将军为人豁达大度，这次坦诚的交谈，误会基本上消除了。

从此，两军的上层进行了频繁的交往。

“双十二”扣蒋前夜，一切都布置停当之后，张派人找崇老等帮助起草声明通电。崇老说：张这个人就是“出马一条枪”，一旦下了决心，说干就干。扣蒋，意在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扣蒋之后，主张杀蒋以谢天下者大有人在。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兵遣将，箭在弦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也是主战主和相持不下。张这时也为统一认识、控制局面而焦虑。直到中共代表团到达，阐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局势才稳定下来。

周副主席在三方会谈中，从国民党的买办资产阶级本性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分析何应钦、汪精卫等主战派和蒋宋孔家族主和派的帝国主义背景；从日本与英美的角逐，分析西安事变的和与战两种前途；又从蒋宋孔家族在国民党中占优势、尤其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分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和平解决的前提，是在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国难当前，必须从民族利益这个大局着眼，争取和平解决。决不能意气用事，计较私怨。如果说私怨，我们共产党人被蒋杀害的何止几千几万？但只要蒋同意一致抗日，我们党主张和平解决。崇老说：这种精辟而深入浅出的分析，令人敬服。以后每次同周副主席的接触，都受到很多教益，“周副主席可称是我入革命之门后的大学教师。”

崇老说：张学良将军毅然以“兵谏”扭转了大局，使内战得以停止，抗日得以实现，是有功劳的。但是，万不该为表白自己动机坦诚而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演出了《落马湖》，“摆队送天霸下山”的悲剧，一去不返。

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国民党和托派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张慕陶、苗剑秋等鼓动孙铭九等主战派少壮军官，

杀害了唯一尚能统御东北军的王以哲将军，造成了东北军的瓦解。崇老见自己已无能为力，遂离高陵到北平。

五十年代初，一次谈起西安事变，崇老说：“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总理批评我当时不应离西安。我自己回想起来，也确有功亏一篑之悔！”

四、抗日救亡，坚持到底

一九四五年初，《新华日报》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社论，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纷纷响应，秘密投奔解放区。我要求崇老介绍我去延安。崇老转述了周副主席“坚持‘东总’阵地，坚持《反攻》牌子”的指示，说：“这里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总得有人作。如果都从延安派来，取得象你们东大学生这样的身份，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接着他举了一九四〇年高存信同志从延安回西安探视时，被特务追捕，他因此而坐牢的例子。又谈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我们安心工作。

“东总”是在我党的指示下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前。崇老说：党很重视“东总”的工作，派刘澜波、于毅夫、于炳然、栗又文等党员同志参加领导机构，工作搞的有声有色，创办《反攻》杂志，组织“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延安输送青年学生，影响很大。因此，国民党对“东总”恨之入骨，严加镇压，到一九三九年，先后查封了西安、成都两个分会，只剩下重庆总会。

崇老说，一九四一年春他到重庆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于毅夫、于炳然等党员同志已无法存身，先后去解放区，“东总”遭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碍于社会影响，国民党不便解散“东总”，就指定CC分子吴焕